

目 录

- 我的姑母刘王立明.....王迪祥(1)✓
高敬亭在太湖的革命斗争事略.....王家在(9)✓
陈振元烈士传略.....许 健(12)✓
- 赵纶士先生和六邑中学.....孔凡礼、查敏求、周 磊(19)✓
清末时期的儒学署和熙湖书院.....赵荆华(28)✓
太湖书院概况.....占贤波、蔡礼亭(34)✓
六十年代实验小学坚持体育训练纪实
.....陈学恒、何家驹(36)✓
- 红二十五军奔袭太湖城.....杨远谋、石 斌(39)✓
北中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始末.....周 勃、石 斌(42)✓
解放后至六六年前太湖的团组织及历届团代会
.....余维和(56)✓
“文革”前十年太湖的财政工作回顾
.....王镇国、石必如(67)✓
反匪反霸和土改人民法庭简介.....李敬勋(79)✓
- 黄梅戏舞台上的第一朵春花——胡普伢.....郝培根(84)✓
《太湖日报》始末小记.....朱家托(91)✓
赵文楷的传说.....江 羊(94)✓
- 抗战初期太湖简况和我所知道的刘保罗同志.....周 磊(96)✓

记刘羊抗日宣传队.....罗 啸(102)✓
抗战小调.....杨远谋(106)✓
日军在太湖的暴行.....杨远谋(108)✓

C C 与桂系争夺安徽青年侧面见闻.....聂俊耀(113)✓

我随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投诚的一点回忆
.....孙家齐(118)✓

天主教在弥陀寺的活动.....吴周明(121)✓

解放前晋熙镇手工业简况.....曾 显(125)✓

浅述民国时期太湖的土地关系.....何耕复(132)✓

乔木寨的风云.....余传明(138)✓

牛凸岭的兴盛和被毁.....杨远谋(141)✓

我的姑母刘王立明

王迪祥

我的姑母刘王立明，生前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在“文革”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时间的迫害折磨，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全国妇联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刘澜涛、李维汉、庄希泉、荣毅仁、胡愈之送了花圈。史良、季方、胡子昂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京的部份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常委、有关机关的群众和姑母的亲属及生前友好，共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致悼词。追悼会后，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李立三等同志的骨灰盒同放一室。

现将我姑母的生平事迹简介如下。

全县头一个放脚的姑娘

一八九六年姑母出生在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十年九灾的地方——安徽太湖县。悬壶行医的外祖父对自己头生女儿十分

— 1 —
王迪祥

钟爱，在孩子刚七、八岁时就拿起案头的《本草》、《汤头诀》教她认字。可是好景不长，姑母九岁那一年，一场急病夺去了这位乡下郎中的生命。原来小康的家道陡然中落，全靠典当变卖、亲友接济和外祖母的一手好针线来维持生活。姑母也就和穷人家孩子一样，起早贪黑拾柴禾、割猪草、帮忙操持家务、照料下面的弟弟，还要经常去向亲友告贷和送典当。就这样，姑母自小就在生活的磨炼下，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和独立不羁的性格。

十岁那年，县里开设了一所福音小学，免费收录那些进不起书馆、私塾的穷孩子。姑母和几个小娃娃看了眼热，三天两头跑去磨那个校长，居然把他给感动了，破例收下这几个女娃。姑母本来就跟外祖父认了不少字，天资又敏悟，在学校里连年都考第一。十二岁那年，她从书本里接触到一些新知识，就不顾外祖母的责打和旁人的讪笑，坚决扯掉了强给她缠上的裹脚布，成为闻名全县的头一个放脚的姑娘。

留 学 美 国

姑母小学毕业后，校长决心把这位得意门生送到一百里开外的九江去深造。这家儒励书院是当时皖赣鄂三省交界方圆千里独一无二的女子中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可申请免交学宿伙食费，衣着零用却得自理。外祖母领着女儿回娘家叩头告帮，开中药铺的舅公碍于手足情面，终于应承补贴外甥女上学的费用。

踏进儒励书院，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小丫头，日夜刻苦用功，很快就把那些出自名门的城里姑娘远远甩在后面。四年毕业，姑母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学校留下来当教员。收入虽然很微薄，对于一向困窘拮据的家庭却不无小

补。长年愁眉不展的外祖母脸上又重新浮起了笑容。

辛亥革命后的第五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姑母考取了留学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单身一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生物学。可是当她学成归国之后，却改变了初衷，投身于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最活跃的妇女社会活动家之一。

献身妇女解放运动

姑母从二十年代起就办妇女刊物，写文章，著书立说，奔波南北，致力于宣传争取国家富强，鼓吹妇女解放，向封建制度和专制势力猛烈开火。她是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她所领导的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是我国最早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娶妾蓄婢、娼妓制度，最先倡导节制生育、妇婴卫生和第一个提出禁烟、禁酒的社会团体。在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举办妇女福利事业方面，她也是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她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了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联合工业社等，并坚持采用勤工俭学、文化补习与职业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抗战前，她在上海创办了专为单身职业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了数百名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分别给予一定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抗战期间在四川叙府创办的湛恩难童教养院，将抢救自襄樊前线的数百难童抚养成人。在重庆李子坝专为职业妇女设立的胜利托儿所，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

为救亡图存而奔走

然而，刘王立明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的还是她在民族

存亡关头所表现的凛然气节，在和反动派斗争时坚持真理，面临生命遭到威胁时的英勇无惧。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她和我姑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就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广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肆无忌惮的侵略。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她鼓励我姑父挑起领导上海各界人民抗日后援工作的重担。她自己也日夜奔波，发动社会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方，抢救伤病员和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平津流亡学生，并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在日伪威逼利诱，妄图迫使我姑父叛离救亡事业，去当傀儡政权教育部长的关键时刻，姑母坚定不移地支持他坚持民族气节，巍然不移。任凭敌人接二连三用毒水果、炸弹等恐怖手段进行威吓，我姑父姑母齐心顶住，毫无畏怯之意。

敌人终于下了毒手。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清晨，身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姑父，被日方特务用达姆弹暗杀于上海街头，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四十三岁。噩耗传出，震惊中外。上海各界人士和市民群众数千人，不顾刺刀炸弹的威胁执绋送葬，形成对敌人暴行的一次大规模抗议。

怒斥国民党顽固派

姑父牺牲后，姑母也被列入敌人的黑名单，但她无所畏惧，抹干了眼泪，转赴武汉、重庆等地继续参加抗战活动。当时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形势，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和各界人士在内的咨询性机构——国民参政会。姑母历任一、二、三届参政员。她在参政会上坚决主张抗战，和投降妥协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她直言不讳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

的种种罪行，一再指名抨击国民党权贵们的专制残暴和贪污腐化，痛陈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被当时采访参政会消息的中外记者誉为“最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

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军政部长何应钦到会作军事报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竭尽诬蔑之能事。中共代表董必武严词驳斥，语音方落，姑母突然登台责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及其他前线将士浴血苦战的英勇事迹，却有心制造摩擦，破坏团结？”何应钦当场被问得无言可答。CC特务分子立刻群起哄闹，把大会搅散。消息传出，重庆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记者纷纷来访，对她的仗义执言表示敬佩。而国民党当局则因此对她更恨之入骨，硬把她挤出了国民参政会。

这时，有些人说“刘王立明变红了”，有的甚至不敢上门了，或悄悄劝她言语谨慎，免得招祸。她不以为然地回答：“我为的是国家和人民，怕什么？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另一方面，她和进步民主人士的交往愈来愈密切了。当时，曾家岩周公馆还送来陕北的红枣、小米和手织粗呢，以示慰问。

争民主、反独裁

一九四四年，她在重庆加入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她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蒋管区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在她领导下，也成为广泛参与爱国民主活动的一个进步团体。她在各地所创办的妇女教育机构和福利救济事业，都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控制和渗入。叙府湛恩难童

教养院，就是当时蒋管区屈指可数的没让宋美龄插手的难童保育机构之一。她又多次把重庆胜利托儿所，用来作为民盟分组会议的会场并为外地来重庆的民盟代表提供食宿。旧政协期间，她还曾受民盟中央委托，出面在胜利托儿所宴请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先后惨遭特务暗杀。消息传到上海，姑母与陶行知先生等不畏危险，挺身而出，在上海为二位烈士举行追悼会。会上，他们声泪俱下地痛斥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并倡议建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紧接着陶先生不幸暴病去世，姑母立即主管会务，一面向中外揭露反动当局摧残民权和践踏民主；一面积极营救、援助被捕遭难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非法，强令解散。姑母摆脱特务的监视，潜离上海到香港参加民盟中央一届三中全会，协助建立民盟临时总部，并被推选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参加筹办进步刊物《远东通讯》（英文版），并在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镇压民主运动的文章，因之曾经两次受到港方警署的传讯。

欢乐和逆境

一九四九年初，姑母欣然接受邀请来到刚解放的北平，代表民盟主席张澜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不久，她被推举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参加开国大典。这时的姑母，心中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后来，她又被选为政协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她还当选为

全国妇联执委会常委。一九五四年，她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际妇女会议。一九五六年，她率领代表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大会，姑母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显著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某些代表污蔑我国生产、输出麻醉毒品的谰言，并促使大会取消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会议的资格。她的发言在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各国代表们纷纷拥上前来叙旧或向她致意，表示对新中国的向往，并一致推选她担任世界妇女节制会的副主席。从不来梅归来，周总理在一次大会作报告时，曾对她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姑母虽然年已花甲，可是精神矍铄，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政治风暴降临了。从来襟怀坦白、心口如一的姑母，一下子就给卷了进去，被扣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从此，她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坎坷半生的姑母，面临生活和地位的急剧下降，丝毫不感到委屈和沮丧。她关掉家中的空屋，只留下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起居室，辞退了保姆，亲自操持家务，甚至打扫庭院和胡同。她蹒跚地往来于东西城之间，一丝不苟地认真参加一切让她去的学习活动和体力劳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关方面曾找她谈过话，讲基于“来去自愿”的原则，如果她想出（国）去，可以提供方便。姑母毫不犹豫地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儿也不去！”

一九六六年初，姑母在挤公共汽车去开会时不慎跌断右

臂，成为残废，去上海她女儿处养伤。不久“文革”开始，姑母被揪出批斗之后，关进监狱，整整折磨了三年八个月后，含冤而逝。她托同监的一位女同志转告她的儿女们说：“妈妈这一辈子是问心无愧的，一定要找到邓大姐为我申冤。”

姑母离开人间已十五年了，历史终于公正地给她的一生做出了结论。

（根据刘光华《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一稿整理）



高敬亭在太湖的革命斗争事略

王家在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一九〇一年八月出生在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三月，由石生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鄂豫皖三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的省委，省委书记沈泽民，宣传部长成仿吾，组织部长高敬亭。高后来担任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苦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鄂豫皖地区国共合作以后，随着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高敬亭自恃有功，居功骄傲，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不幸在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的批示，给高敬亭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在安徽省合肥殡仪馆举行了高敬亭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下面是有关高敬亭同志在太湖革命斗争事略。

—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团团长陈守信、团政委徐成基率独立团转战到

今岳阳县

皖西，在金寨县与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团会师，并带来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临走时给高敬亭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花山寨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和，责成高敬亭统一苏区红军武装，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

高敬亭接到指示信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即民国二十三年腊月三十日旧历除夕），在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今刘畈乡境内）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并作出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将皖西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第三次重组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辖二四四团三个战斗营和一个特务营，并成立直属手枪团，全军共一千四百余人。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二是发展地方武装，成立四路游击师，在太湖、潜山、英山、霍山四县交界处创立游击根据地。

红二十八军的重建，使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又有了中坚力量。它向敌人宣告，红军是消灭不了的，走了红二十五军，还有红二十八军，红军是革命人民的后盾，革命是镇压不了的。凉亭坳会议对于继续高举太别山区革命红旗，统一鄂豫皖边区红军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九三六年初，在太湖县柴家山（今安陆乡境内）召开了红二十八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为了打乱卫立煌的“清剿”，高敬亭在会上提出了避敌锋芒，把部队分散插入敌后活动的对策。会后，红二十八军即以营为单位，从山区下平原，从内线出外线，深入敌后纵横驰骋。接着打了好几次漂亮仗，取得化装智取东阳冈、石家寨攻坚战、三店伏击战歼敌一个营等等辉煌战果。一九三六年九月，敌人只得将兵力撤出

根据地中心山区，使鄂豫皖根据地得到很大的恢复，红二十八军也得到了发展。

二

在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一起，总结出许多大体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

第一，“敌上山，我下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术。

第二，伪装战术。

第三，“四打四不打”和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

通过实践，高敬亭提出三打三不打，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在以后的战斗中，又补充了“无大伤亡就打，伤亡大则不打”。

第四，杀“回马枪”后发制人，用“口袋术”出奇制胜。

三

高敬亭同志从参加革命起，就在党的领导下不辞劳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领导红军二十八军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使大别山红旗不倒，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虽然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毕竟还是革命队伍内部问题，他功大于过，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陈振元烈士传略

许 健

革命烈士陈振元（1899—1947），系我县现江塘乡白云村新屋生产小组人，自幼聪敏好学，但因家境贫寒曾两次辍学。他二十一岁（1920）即以教书为业，谋求一家的生计。当时，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屈从于帝国主义，致使中华民族动荡不安，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陈振元开始用敏锐的目光洞察社会，竭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渐渐地，他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很有兴趣，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因此，七年后他毅然

——弃笔从戎 投身革命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暂时失去了革命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沉痛的教训，重新开始组织革命武装力量。这年八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副书记柯庆施等革命者来我县宣传革命真理，组织进步青年入党。血气方刚的陈振元旋即响应党的号召，随甘陵等二十三人投身革命阵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我县南乡白安古庙里秘密成立了中共二十一区党部。陈振元当选为二十一区党部的宣传员、联络员。同年十月，中共太湖县党部在马家花园（今太中附近）成立。陈振元当选为中共太湖县委委

员。

一九二九年五月的一天，陈振元等一百多人正在我县罗湾乡烟店村吴家老屋吴之光家吃午饭，突悉侦察员吴开元、吴普应的报告：国民党十七师第二团剿共部队已从新仓渡过长河，向太湖县城进发。得此消息后，许多人欲直接抵制敌军。陈振元考虑到敌众我寡，硬拼只会损失有生力量，决定采取游击战术牵制敌人。他命令一百多人在罗湾乡八里冲到吴家祠堂八里长的阵地上沿途埋伏，待命袭敌。敌军开路的骑兵大队进入我阵地后，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顿时乱成一团慌忙应战；与此同时，敌人的步兵也得到了更为猛烈的打击，个个抱头鼠窜。敌人的骑兵和步兵横冲乱撞自相残杀。陈振元只身一人亲临指挥。打了半个多钟头，他即命战斗员悄然撤退。敌军伤亡很大，他们既不知我方有多少人马，也不熟悉地形，不敢妄然前行，只好垂头丧气地在罗湾乡吴家祠堂扎营露宿。

陈振元带领队员们撤到吴之光家，安置好伤员，稍事休息后夜行八里偷袭敌营。

敌军因旅途劳累，并依仗人多势众，只在营外设立两个岗哨，其余人马都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陈振元带两名机警的队员摸近岗哨，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一把掐住对方，三人随即将其挟走，秘密处死。眨眼间，一百多队员迅猛地冲进敌营，许多敌人还没清醒过来，就饮弹而死。刹那间，敌营内枪声大作，我队员们按战前的统一部署，缴走敌人二百多条枪，杀死敌兵二百多人，即撤离战场。陈振元带领队员们连夜向新仓街奔去。不料，因叛徒告密，伪自卫队在伪行官何海潮的指使下，已包围新仓街。次日黎明时分，我队员们涉水涉过长河，挺入新仓。终因敌

众我寡，我队员们被伪自卫军打散。陈振元见状跑入殷宣武家茶馆内，当场被捕。伪自卫队将陈振元捆绑后，拳打脚踢，欲置他于死地。正在这危难之时，我失散队员又开始了反击，伪自卫队慌忙纠集兵力对付。新仓街人民亦云集于殷宣武家茶馆，硬从伪自卫队手里把陈振元抢走。陈振元这才从死里逃生。

反动武装在我县遭到有力的打击后，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兵力，疯狂剿共。我县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县革命组织实行了战略性的转移。

一九三〇年元月，陈振元从方启坤（王步文之妻）同志那里拿到党组织的介绍信后，即

——四处辗转 继续革命

一九三〇年，陈振元几经周折，终于在河南找到了红军游击区司令员徐海东同志。徐司令员核实了陈振元的介绍信，并对他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即命他参加地下工作队伍。陈振元受命后即找到他祖父的学生李敏仲（国民党河南孟县县长），申求李为自己找工作，李碍于陈振元祖父的情面，便介绍他到驻河南国民党陆军九十五师步兵二八五六旅第×团任上尉司书。陈振元借此向国民党兵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开展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一九三六年徐司令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率军北上抗日。临行前，徐司令员命令陈振元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并将他介绍给黄安总支。

一九四五年五月，皖西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由湖北麻城开往岳西。为加强后方阵地，党组织命令陈振元离开河南回原籍开展群众工作。

陈振元回到家乡后，即在我县牌楼乡团湖村发动农民，组织了泗水合作社。泗水合作社成立后，立即为农民开展供销、信用等工作，团结广大农民。许多农民纷纷报名入社。一九四五年十月，陈振元组织召开了泗水村合作社员大会，社员们一致推选他为泗水村合作社理事会主席。陈振元同志借机向社员们宣传革命真理，对社员实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鼓励社员起来与地主恶霸斗争，要求社员做到“合力发展生产，共谋流畅资金，物价公平，加强农民组织，发扬革命精神”。

陈振元与社员同甘共苦，深得社员们的尊敬。许多社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勇敢地与地主恶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的斗争，革命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国民党反动派为此惶惶不安，当时的国民党安徽省省长李品仙命太湖县县长陆武功来团湖破坏泗水村合作社。刹时，杀人不眨眼的陆武功开始了对革命人士的大屠杀。陈振元只得再次

——转入地下 智取军粮

一九四六年四月，陈振元化名陈灿霞，奔赴上海找到他妹夫韩述之（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中共地下党员）。韩即将其介绍给他的同学方壮尤（当时我县国民党田粮处处长），方便任命陈振元为我县寺前粮办处主任。寺前粮办处收购青石、黄悖、寺前、罗湾、赤滩五个乡的粮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因死我军，对粮食监管甚严。陈振元上任后，上级党组织即命他贮存粮食，接应我南下的大军。陈振元巧设机关，他将五个乡的粮食分派给各乡、保贮存，不得向外出卖。同年十月，国民党太湖县县长谢尧派人到寺前押粮。陈振元借口粮食还没集中在一起，兼之天旱无